

新湖南報社的反右鬥爭

• 朱 正

一 事情正在起變化

毛澤東在決心反右派的第一個文件〈事情正在起變化〉中，突出地提出了報紙問題：「他們否認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他們混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與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原則區別，……新聞界右派還有號召工農群眾反對政府的迹象。」^①新聞界當然就是反右派鬥爭的一個重點。

當年新聞界的反右派鬥爭，全國最突出的，據我所知，是《新湖南報》編輯部。《湖南省志》有如下的記載^②：

當時《新湖南報》編輯部包括《湖南農民報》在內，不過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54人，佔當時編輯部總人數的三分之一，且多是新聞工作骨幹，其中編委8人，包括原社長鄧鈞洪、原副總編輯蘇辛濤等。有的同志早已調離報社，也調回批鬥。株連之廣，比例之大，損失之重，全國新聞界無出其右。

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所作的預算：「右派大約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③，新湖南報社的實際戰績超過毛的最高估計三倍多。不論就百分比來說，還是就絕對數字來說，該社在當年全國各新聞單位中都居第一位。比被毛澤東兩次撰文批判的頭一張右派報紙《文匯報》，比章伯鈞任社長、儲安平任總編輯的《光明日報》，比全國第一家報紙《人民日報》所劃的右派份子都要多。

《新湖南報》是中共湖南省委的機關報。黨報是黨委的一個工作部門，對其幹部的政治素質要求很高。當時新湖南報的幹部隊伍，主要是由三部分人組成的：一部分是由李銳、朱九思率領從冀察熱遼解放區《群眾日報》南下的，絕大多數是黨員，其中有延安《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的老人。一部分是解放前在長沙一些報紙工作的地下黨員。一部分是報紙初創時辦的一個新聞幹部訓

當時《新湖南報》編輯部不過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54人，佔當時編輯部總人數的三分之一。不論就百分比來說，還是就絕對數字來說，在當年全國各新聞單位中都居第一位。

練班的學員，李銳在一篇回憶文裏說到這個訓練班：「考生都是政治素質比較好的青年，由地下黨或其他革命組織介紹報名，錄取的100多個學員中，有不少是黨員或外圍組織的成員。」④到1957年，他們中又有一些人入了黨，成了業務骨幹。這樣一支幹部隊伍，怎麼會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呢？這就很值得說一說了。

分析一下，這54名右派份子，有一個黨內右派小集團，有一個黨外右派小集團，還有不屬於這兩個集團的一些零散的右派份子。下面，就劃右派的先後次序分別加以介紹。

二 向唐蔭蓀宣戰

1957年5月1日，各報刊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宣布一個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開始。同以往的三反五反鎮反肅反那些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不同，〈指示〉提出了「和風細雨」，提出了「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些原則，並且規定：「開會應該只限於人數不多的座談會和小組會，應該多採用同志間談心的方式，即個別地交談，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還說要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

幾天之後，新湖南報總編輯官健平在全社大會上作動員報告，宣布報社開始整風，號召全體人員向報社領導提意見，反對三個主義。內容大體上就是按照中央指示說的。動員大會之後，即分小組開會座談，向領導提意見了。

那時，《人民日報》逐日詳細報導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發言，新湖南報社的座談會也從這些報導中受到啟發，一些人學着說他們說的那些話，例如外行領導內行之類。在這一方面，他們對官健平提出了不少批評，說他對報紙業務一不懂二不鑽，外行得很。徐鑄成在〈「牆」是能夠拆掉的〉一文中，說《文匯報》的一位黨員副總編輯「有一套本事，能夠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⑤，這話在新湖南報社引起了共鳴，一些人說，官健平所有的，正是這樣一套本事。

在新湖南報社各小組的座談會上，一些肅反對象訴說自己在肅反運動中受的委屈；也有人慷慨激昂地質問（還拍了桌子）：「為甚麼原副總編輯鄧鈞洪調離報社的時候借支的公款不要歸還，而我的借支卻每月都要扣還？」還有人提出在幹部的提拔和使用上有宗派主義，厚待了誰，又虧待了誰。如此等等。

這樣的小組討論延續了兩三個星期吧，也就冷了下來，小組會也不再開。大家並沒有感覺甚麼異樣，以為要說的話都說過了，也不必多開會了吧。現在想來，冷下來的原因是毛澤東那篇秘密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已經下達，要將整風轉變為反右派鬥爭了。人事科也忙起來，晚上都加班，有人議論這事，不知道是為甚麼。事後想來，當是為反右派鬥爭作準備吧。

6月8日一早起來，人們吃驚地在報上看到《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甚麼？〉，過兩天，又是社論〈工人說話了〉。大家知道，風雲突變了，反右派鬥爭

《新湖南報》是中共湖南省委的機關報，對其幹部的政治素質要求很高。其幹部隊伍主要是由三部分人組成的：一部分是從冀察熱遼解放區《群眾日報》南下的；一部分是解放前的地下黨員；一部分是一個新聞幹部訓練班的學員。這樣一支幹部隊伍，怎麼會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呢？



1957年春天，唐蔭蓀(圖)在新湖南報文教部的辦公室裏工作，這時距他成為右派份子只有幾個月。唐蔭蓀成為新湖南報反出來的第一個右派份子，是因為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新湖南報》的反右派報導中說：「唐蔭蓀就是民盟右派集團安放在本報的坐探。」反右派鬥爭拿他來祭旗，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開始了。《新湖南報》在版面上當然立刻有了反映，每天都以很大的篇幅報導省內外的反右派鬥爭。至於報社內部，一時卻頗為沉悶，不見動靜。官健平在黨支部會上作了反右派的動員，號召共產黨員起來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至於他有沒有在包括黨外幹部的全社大會上也作了這樣的動員，我就不記得了。

新湖南報反出來的第一個右派份子唐蔭蓀，大約是7月8日，黑板報的大字標題是〈向唐蔭蓀宣戰〉。當時大家都知道要反右派了，但是都沒有想到第一個會是他，很覺意外。他很文靜，工作努力，人緣也好，以前也沒有受過甚麼批評。整風鳴放中，好些人都比他更活躍，發言也比他更尖銳、更刺激，這些人都還沒有被劃成右派，為甚麼第一名右派是他呢？

現在想來，就不難明白了。唐蔭蓀當然應該是新湖南報社的第一名右派份子，因為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他上大學的時候，不滿國民黨的統治，想找共產黨，找不到，找到了民盟，就加入了。他自以為是冒着危險參加革命，沒有想到幾年之後這卻成了他受打擊的一個原因。反右派鬥爭的主要鋒芒就是針對民盟的。毛澤東在為《人民日報》撰寫的「七一」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宣稱：「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⑥這裏說的「章羅同盟」，即「以章伯鈞、羅隆基為主要代表的中國民主同盟」的簡稱，毛澤東有這樣用簡稱的習慣，例如他把楊得志、羅瑞卿、耿飆統率的華北野戰軍第二兵團稱為「楊羅耿兵團」^⑦。黨報原是不讓民主黨派發展組織的，但唐蔭蓀是解放前參加民盟，後來考入新聞幹部訓練班，到新湖南報工作，參加了青年團，卻還保留了盟員身分。他是新湖南報社唯一的民主黨派成員。《新湖南報》的反右派報導中說：「唐蔭蓀就是民盟右派集團安放在本報的坐探。」^⑧反右派鬥爭拿他來祭旗，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唐蔭蓀最主要的一項右派罪行，是籌辦同人報。當時報上宣布，他、鍾叔河、鄭昌壬、李長恭、朱純五人，是一個籌辦同人報的右派小集團：「在大鳴大放中，民盟右派集團為了與黨分庭抗禮，籠絡知識份子，辦報的雄心勃勃。因此，他們之間很快地結合起來，共同密謀開辦同人報。」^⑨

民盟湖南省委原來是有一張對開日報的。1949年8月5日長沙解放，7日，由民盟湖南省委宣傳部長楊伯峻任社長的《民主報》在長沙出刊，總主筆杜邁之，該報有王西彥主編的「新文學」，楊榮國主編的「新知識」等等專刊。這張報紙從創刊起，就受到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的壓力。一次因為刊登了某一稿件，受到《新湖南報》讀者服務欄刊出的眾多讀者投書的圍攻。該報又無固定財源，向銀行貸了幾次款，終於無法維持，於1950年12月11日停刊，人員星散。楊伯峻從此潛心著述，成了研究古漢語的著名學者。一些編輯記者，如朱純和後來也成了右派份子的嚴伯嘉等，就調到新湖南報來了。

整風鳴放初期，譚震林到了湖南。他批評了《新湖南報》，說是「死人辦死報」，還說每個省可以辦兩個報紙，一個黨外辦，唱對台戲。其實這些都不是譚本人的意見。「死人辦報」是毛澤東罵鄧拓的話，表示了他對《人民日報》對鳴放報導不力的不滿。辦兩個報唱對台戲，是4月間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開會時毛澤東的插話。譚震林的這些話傳到了民盟湖南省委秘書長杜邁之的耳朵裏，儘管他不知道這是轉述毛澤東的意思，就是譚震林的意見，中央書記處書記也已經夠權威了。這個信息使杜邁之十分興奮，於是躍躍欲試，想重新辦起一張報紙來。唐蔭蓀是盟員，朱純是《民主報》的老人，鍾叔河是朱純的丈夫，再邀了李長恭、鄭昌壬兩個。這五個人就成了「一個與民盟右派集團有密切聯繫」的小集團，他們是要辦「一張湖南的《文匯報》——在民盟右派集團領導下的反共、反人民的同人報」^⑩。

事實上，像經濟來源、社址這些至關重要的先決條件都沒有涉及到，不過是有此意願，有些談論，也就足夠劃為右派了。

對這個小集團的最後處理，唐蔭蓀的處分最輕，是監督勞動，其他4人都是勞動教養。由此也可見唐被列為小集團之首，完全是因為他的民盟盟員身分。

整風鳴放初期，譚震林到了湖南。他說每個省可以辦兩個報紙，一個黨外辦，唱對台戲。這些話傳到了民盟湖南省委秘書長杜邁之的耳朵裏，他十分興奮，想重新辦起一張報紙。而唐蔭蓀、朱純、鍾叔河、李長恭、鄭昌壬這五個人就成了「一個與民盟右派集團有密切聯繫」的小集團，他們要辦一張湖南的《文匯報》。

三 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爭論

在反出這個黨外右派小集團之後不久，新湖南報又反出了一個黨內右派小集團。這個小集團共20餘人，約佔全社右派份子半數。其中包括鄧鈞洪、蘇辛濤兩位副總編輯以及傅白蘆、蔡克誠、柏原、李冰封、張雨林、袁家式6位編委，此外多是各報導部主任副主任等中層幹部，業務骨幹可說是一網打盡。

所以會發生這事，有一個背景，就是在1956年編委會內部有過一場「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爭論」。事情得從1955年說起。原來主持全面工作的副總編輯鄧鈞洪調任湖南省人民委員會文教辦公室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另派官健平任新湖南報總編輯。此人對報紙業務懂得不多，在他的主持下，報紙版面充斥着每年周而復始的農事活動的報導：春耕、積肥、抗旱、防汛……。省委和業務領導

部門送來的那些工作指示、總結報告等等，他全都登在報上。多數編委認為報紙不能這樣辦，提出要從報紙的特點出發，要把報紙辦得豐富多彩，讀者才願意看。於是，在編委會內，以官健平和秘書長孟樹德為一方，蘇辛濤和其他幾個編委為另一方，就此展開了爭論。

爭論的情況，《湖南省志》有簡略的記載^①：

1956年3月一組關於農業社包工定額的經驗介紹加劇了上述兩種意見的對立。這組報導共9篇，最突出的是3月11日〈長沙縣合心農業社進行分季分級定額的作法〉一文，長一萬多字，登了整整一版。其中「定額表」佔一半以上，將169項農活，按春夏秋冬分四季和副業，分為1-7級，定出工分標準，全部是繁瑣的數字。文章透露，定額公布後，「社員顧慮很多」，但報紙卻當作樣板向全省推薦。不久，編輯部內部舉辦改進報紙工作展覽會，把這篇文章當作反面典型，並加了批語：「究竟是內部刊物，還是黨報？竟用如此大的篇幅來刊登只供少數人閱看的東西！何況在此以前已登過不少類似的了。難怪人們說它是『大地主』！」「大地主」一詞，出自胡喬木〈短些、再短些〉一文，本是形容文章過長，浪費了報紙的篇幅。有人卻指責說：「最露骨的是把合心鄉的經驗當作惡霸大地主。……省委書記和農村工作部長作了廣播，要在全省推廣。如果我們真的把它打倒不登，那能算是省委機關報嗎？」

胡喬木的〈短些、再短些〉一文曾經編印在新湖南報社的業務學習材料裏，其中「大地主」不過是形容那些佔據大塊版面的長文章。在爭論中，孟樹德就加以曲解，說是把省委交來發表的文章看做應該打倒的惡霸地主。這就已經是反右派鬥爭中大批判的先聲了。

這場爭論持續了半年，雙方互不相讓，誰也說服不了對方。在蘇辛濤等人一方，多是老報人，有辦報經驗，又有《人民日報》改版報告等等文件作依據，以為道理在自己手上。可是不論他們怎麼說得頭頭是道，可就是無法說服官健平。原來，官健平也是身不由己，他不過是省委那一位分管報紙的領導人派駐報社的代理人罷了。那位領導人就是因為原來報紙沒有能夠按照他的意圖去辦，十分不滿，才調開鄧鈞洪，派官健平來。官健平來的任務就是改造報紙，就是要把報紙辦得符合那一位領導人的要求。在爭論中，不是有人提出了要從報紙的特點出發嗎，官健平說了一句警句：「省委的意圖就是報紙的特點。」假如官健平向多數編委的意見讓步，同意從報紙的特點出發，那他他就是個不稱職的代理人，也就不會讓他留在總編輯的坐位上了。有人天真地認為，是省委偏聽偏信，受了官健平的蒙蔽，不了解新湖南報的情況，希望省委能下來聽取爭論雙方的意見。不過也有人感覺到了，說：「省委實際上是報社爭論中的一方。」

鄧鈞洪在多年之後寫的〈追記新湖南報的反右鬥爭〉一文中說^②：

在歷時半年的爭論中，這位省委領導大發雷霆，在與周小舟同車時，發牢騷說：「新湖南報的知識份子要反對我，你看怎麼辦？」周小舟沒有表態，而是主張把爭論繼續下去，並一再鼓勵我們：「真理越辯越明。」

胡喬木的〈短些、再短些〉一文中所講的「大地主」，不過是形容那些佔據大塊版面的長文章。在爭論中，孟樹德就加以曲解，說是把省委交來發表的文章看做應該打倒的惡霸地主。官健平說：「省委的意圖就是報紙的特點。」這就已經是反右派鬥爭中大批判的先聲了。

鄧鈞洪在這裏透露了一個事實，即這位分管報紙的領導人同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的分歧。周小舟是個溫和的人，對反右派鬥爭，特別是對新湖南報社的反右派鬥爭，實際上是不以為然的。《周小舟傳》中含蓄地反映了這一點^⑬：

此時，湖南的反右派鬥爭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到9月上半月止，省直機關「千軍萬馬反擊右派，戰果輝煌，捷報頻傳」，「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三倍多，黨內右派比7月底增加四倍多」。對於反右擴大化的問題，周小舟雖然已有察覺，並持保留態度，但大局已成，他也無能為力。在他非常熟悉的《湖南日報》編輯部，由於1956年3月的一場關於辦報方針問題的爭論，竟然在1957年至1958年，製造了一個全國僅有的特大的「反黨右派集團」，幾乎一網打盡了勇於堅持正確辦報方針和中央及省委關於改進報紙工作決議的全部業務骨幹。此時此刻，周小舟坐立不安，進退失據。他覺得眼前的現實，和他過去聆聽的毛主席的教誨是如此不相協調。難道說，一夜之間，這些多年共事的戰友就變成了蔣介石或納吉麼？他憂心如焚，難以自解……

1957年湖南的反右派鬥爭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到9月上半月止，省直機關「千軍萬馬反擊右派，戰果輝煌，捷報頻傳」，「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三倍多，黨內右派比7月底增加四倍多」。《湖南日報》編輯部製造了一個全國僅有的特大的「反黨右派集團」，幾乎一網打盡了勇於堅持正確辦報方針的全部業務骨幹。

納吉在匈牙利事件中被擁戴為總理，事件平息後被處死。這裏為甚麼提到納吉呢？因那位分管報紙的領導人說：「報社的問題，匈牙利問題，是一碼事。」

1957年3月，蘇辛濤到北京出席了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聽了毛澤東的講話，還聽了毛在2月底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的錄音。在座談會上，毛表揚了《文匯報》，說它辦得活潑，登些琴棋書畫之類，他也愛看。鄧拓在會上作了發言，蘇辛濤覺得，其中對經驗技術的宣傳甚至比他自己還要厭惡得多。所有這些，都使他很受鼓舞。《新湖南報》的反右派報導中說^⑭：

今年3月，蘇辛濤從北京參加中央宣傳會議歸來，和其他右派份子一樣，自以為給他的反動論點找到了甚麼「根據」，剛一到家，就得意洋洋地對小集團的成員及別的同志說：「我們的問題在北京解決了。」他以「勝利者」的姿態鼓勵傅白蘆、蔡克誠等重整旗鼓，向黨進攻。

蘇辛濤的興奮並沒有多久，整風便轉變為反右派鬥爭。他和那些主張改進報紙的編委，以及贊同他們意見的中層骨幹，被打成一個黨內右派小集團。他們的主張被宣布為資產階級新聞觀點。已調離報社的鄧鈞洪、李冰封，正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新聞班學習的柏原，都調回報社批鬥，劃為右派份子。

反右派鬥爭一舉摧毀了新湖南報編委會，省委另派了楊大治來任副總編輯，胡開駟、梁中夫來任編委。另外還從其他單位抽調了一批人員來任編輯記者，這樣才維持了報紙的連續出版。可以附帶提一句：這楊大治和梁中夫到1959年又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

除了前述兩個右派小集團之外，新湖南報還劃了一批零散的右派份子。其中有一些是1955年的肅反對象，他們是在整風鳴放中對肅反運動提了意見，才被劃為右派的。在肅反運動中，新湖南報立案審查的有十餘人。他們之中，有的人，像朱正和鍾叔河，在政治歷史上毫無問題，有的即使有甚麼問題，也並不是在肅反運動中查明的，而是相反，都是因為自己早已交代了這些問題才被列為肅反對象。這些人被內查外調、檢舉坦白、批判鬥爭，折騰了大約一年。其中三人還被宣布逮捕法辦，捉到看守所關了幾個月，到運動結束時才放回報社來。結果並沒有肅出一個反革命份子。後來他們(包括「逮捕法辦」的)多已享受離休老幹部待遇了。

這些人，自己本沒有甚麼問題，或者沒有隱瞞甚麼問題，卻被列為肅反對象，平白無故失去一年自由，挨了多次批鬥，不免有些怨氣。整風運動開始，號召向領導提意見，於是有些肅反對象就把這問題提出來，要求「給一個說法」。這些人就都被劃成右派份子了。按《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規定：「攻擊肅清反革命份子的鬥爭」的，「應劃為右派份子」。新湖南報的54名右派份子中，有譚震、鄒今鐸、蕭湘、周艾從、朱正、鍾叔河等9人是肅反對象。中右份子有兩人是肅反對象。還有一人原在新湖南報被列為肅反對象，肅反後調湖南工人報，由湖南省總工會劃為右派。

四 右派份子的下場

新湖南報(包括湖南農民報)的54名右派份子中，最早自殺的是黃德瑜。在一次批鬥他的鬥爭會之後，他只穿着短褲和拖鞋出走，從此就失蹤了。當時曾多次尋找，都沒有找到。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報一些右派份子鬧翻案的時候，1979年全面解決右派份子問題的時候，他都沒有出現，必定是不在人世了。前些年黃德瑜的兒子找到報社來，報社給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1958年4月底，報社開大會，宣布對右派份子的處分。據前引鄧鈞洪的文章說：「12人被送勞動教養、11人被監督勞動，其餘均受到開除公職、開除黨團籍和撤職降級的各種處分。……不少人妻離子散，有的迫於生計，只好流落街頭，靠拖板車為生。」^⑤

在農村監督勞動中自殺的，有歐陽楠。

1960年，在長沙新生電機廠勞動教養的李長恭等人，一天加班到深夜，肚子餓了，想把次日的早餐換成當天的晚餐提前吃，伙房說要請示事務長，李長恭就去敲事務長的門。結果飯沒有吃到，卻被定性為企圖利用糧食困難製造的反革命暴亂，被判刑12年，跟在後面也想吃餐飯的周艾從判管制3年。李長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廠服刑，文化大革命開始，他被宣布是該廠的「三家村」成員，予以批鬥，他很覺厭倦，就跳崖自殺了。

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報的一些右派份子起來大搞翻案活動。當年反右很起勁的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長唐麟，此時卻成為翻案的積極支持者了。他甚至說：「支持不支持新湖南報受迫害同志的正義行動，是擁護不擁護毛主席革命路

1958年4月底，新湖南報社開大會，宣布對54名右派份子的處分：12人被送勞動教養、11人被監督勞動，其餘開除公職、開除黨團籍和撤職降級。不少人妻離子散，有的迫於生計，只好流落街頭，靠拖板車為生。1979年，當年新湖南報所劃的右派份子陸續宣布改正，包括判了死刑、判了徒刑的在內，沒有一個沒改正的。

線的試金石。」只是他此刻的支持起不了任何作用，翻案並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顧不暇，不久也就跳樓自殺了。

翻案者也付出了代價。蔡克誠被報社的造反組織「紅色新聞兵」抓去，在關押中忍受不了毆打凌辱，自殺身亡。李均因翻案被判徒刑20年，關了4年多才改為免于刑事處分，放了出來。

劉鳳翔也是翻案活動的參加者，他在1969年被判刑15年，到1970年4月4日就以反革命集團罪被槍決了。到1985年他才獲徹底平反昭雪，宣布恢復其黨籍，恢復一切政治名譽。

此外，還有譚震、蕭湘、鍾叔河、藍崗、朱正等人先後被判了刑期長短不一的徒刑。

1979年，當年新湖南報所劃的右派份子陸續宣布改正，包括判了死刑、判了徒刑的在內，沒有一個沒改正的。一部分由報社收回，一部分收回後再介紹到別的文化教育機構去，繼續從事專業工作。到1983年，也有幾個人做了官：柏原做了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傅白蘆做了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湖南日報社長，李冰封做了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湖南省出版局長，張式軍做了中共湖南省委黨校副校長，其妻羅光裳做了湖南省婦女聯合會副主任，李均做了湖南日報副總編輯，楊德嘉做了省出版局副局長。只是年紀都老了，現已全部離職休養。

註釋

①③⑥ 《毛澤東選集》，卷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424-25；424；435。

②⑩ 〈新聞出版志·報業〉，《湖南省志》，卷二十（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頁233；232-33。

④ 李銳：《李銳往事雜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112。

⑤ 《文匯報》，1957年5月19日。

⑦ 《毛澤東選集》，卷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364。

⑧⑨⑩ 〈本報反右派鬥爭又獲重大勝利——另一個右派小集團原形畢露〉，《新湖南報》，1957年9月5日。

⑫⑬ 《新聞記者》（上海），1989年第6期。

⑭ 周小舟傳記編寫組：《周小舟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56-57。

⑮ 〈本報反右派鬥爭獲得重大勝利——揭穿黨內右派蘇辛濤、傅白蘆、蔡克誠反動面目〉，《新湖南報》，1957年8月19日。

朱 正 1931年生於長沙，1949年9月考入新聞幹部訓練班，結業後分派到新湖南報社工作。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1979年以後從事出版工作。著有《魯迅傳略》、《魯迅回憶錄正誤》、《人和書》、《留一點謎語給你猜》、《思想的風景》等。